

中国新闻史资料选编

第一集

广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研室

1979·7

目 录

中国报纸进化小史	1
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	4
“五四”时期报刊工作的改革	14
湘江评论	26
一个“五四”时期的政治刊物——每周评论	39
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机关报——向导	42
青年团的第一个机关刊物——先驱半月刊	75
中国工人月刊	83
热血日报	86
为新生活而斗争的有力武器	92
1931年——1936年间上海出版的几种革命报刊简介	94
略记抗战日报	103
在晋绥日报的年代里	108
华北敌后新闻事业回 意	126
晋冀鲁豫边区的新闻出版工作	131
解放日报创刊一千期	136
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和主要进步报刊简介	140
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	162
1937——1945年新闻界大事纪要	178
华中新闻事业概观	207
1948年各解放区出版的报纸	210

——一九二二年

我国新闻事业，发轫最早。在昔商周之际，政府已设置专官，春秋二季，出巡列邦，采风问俗，归而上诸太史。刘歆与扬雄书曰：「三代周秦，轩车使者、尤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，求代语。童谣歌戏。」而周官太史所掌，亦曰「陈诗以观风」，大抵今日所传诗歌，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，要亦当时新闻之流亚。王安石目《春秋》为断烂朝报，良有以也。观于英儒安德履所称英国初有手缮新闻函，供贵族浏览，嗣以求之者众，学者编为歌谣，以广流传等语，其进化之迹，足以互相印证。惟其时采摭所得，仅备政府浏览，天府高深，庶民未由窥读，揆之新闻原则，蒐罗则有之，传播未也。至其以当代政闻，刊播民间，要在活版创行以后。考印刷一术，创于隋唐，活版稍后出。唐诗话称：韩愈家居，一日，有人叩门贺曰：「邸报制诰阙人，中书进君，已除驾部郎中知制诰矣。」邸报见于书册，此为最早。其后东坡诗云「坐观邸报谈迂叟」，周密《癸辛杂志续集》所纪王火烧一则，亦有「邸报既行」之语，是知邸报之制，癸初于唐，而两宋承之。惜当时撰辑情形，刊行期日，典册罕纪，邈无所考，然其为我国官报鼻祖，可断言也。沿及元明，或称邸抄，迨乎清代，遂有《京报》，民国改元，衍为《政府公报》，内容一以官廷谕旨、大吏章奏为准。其他不及焉。盖自唐宋迄于逊清中叶，千有余年，实为官报时期。自嘉道以降，欧风东被，始有西文报纸流入中国，而二三西哲，亦间有华文报

④ 节录一九二二年申报馆纪念特刊《最近之五十年》，作者为《申报》早期主笔之一。

紙之刊。行之既久，風氣漸開，國人踵起仿行，近世報紙，由是興焉。考西人所辦華文報紙，以馬禮遜之《東西洋每月統紀傳》（按系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》之誤）、麥都思之《特選撮要》發行最早，並在嘉慶季年，惜不久俱廢。咸豐三年，《遐迩貫珍》刊于香港，七年，《六合叢談》刊于上海，《中外新報》刊于寧波。同治季年，《中西見聞錄》刊于京師，皆每月一編，聘請海內名彥襄理筆政，于譯載中西要聞外，並講格致、天算、藝器諸學，頗與雜誌相類。至日報之刊，則自咸豐四年香港之《中外新報》始，體例一仿西國報紙，間日出版。未几，上海有《字林新報》，廣州有《七日錄》，香港有《華字日報》、《循環日報》，至同治十一年而《申報》誕生。同時廣州有《粵報》，天津有《時報》，稍晚，上海復有《匯報》、《彙報》、《益報》等（諸報亦有稱在《申報》刊以前者，茲據王韜說如此）。然諸報大都旋起旋滅，未克久存，唯《申報》至今五十周星，歷年之久，卓然杰出于全國報界之林。當咸同之世，風氣未開，交通艱阻，採訪乏人，廣告稀少，日出不過一葉，行銷不逾千份，內容除轉錄《京報》，並由中國通儒撰著論說外，余以采譯西報為多。嗣后十余年間雖時有新創，而停版者亦不少。迨甲午以後，外患日亟，國人競講新學，津、漢、滬、廣諸埠，報館云興，《新聞報》、《七日報》、《直報》、《津報》、《漢報》、《叻報》、《中西報》、《博聞報》等，一時並起，上海尤為薈萃之所，而國人自辦之叢報，亦發軔于斯時。光緒二十二年，《時務報》首創于上海，未几而《湘學新報》、《昌言報》、《實學報》、《新學報》等先後踵興。諸報皆以開通民易俗，汲引新知為旨，故于摘譯西報外，並講政藝、史地、天算、格致諸學。發行之期，或旬日或半月不等。中更戊戌之變，各報一時俱停，其間有苟延喘息者，亦僅託庇外人，聊免于盡而已。庚子以還，官厅壓力稍弛，

新创者渐众，而旧有报纸，亦由国人购回自办，新闻事业，至是始有欣欣向荣之观。其时风气渐开，交通便利，行销日广，各报莫不扩充范围，添聘访员，通商大埠，施用電报传递，以期消息迅捷。甲辰、乙巳以后，各报多出二三大张，体例愈益完密。迨乎宣统，内地府县並有地方报纸之刊，已弱弱焉自披露新闻而入于宣传民意之时期矣。武汉首义，全国响应，报纸之传播不为无功，一时民气发扬，政党各派竞言办报，北京首都骤然增至二十余家，上海一隅亦有十余家，新闻事业遂如怒潮奔腾，一日千里，不仅通商大埠报馆林立，即内地小邑亦各有地方报一二种，统计全国新闻纸类，不下一千一百四十余种，至于行销之广，告白之盛，实所罕观。当民国元二年間，盖为报界极盛时期，时值国体更新，言论自由，指陈利害，商榷时政，类皆藉报纸以宣传民意。迨洪宪窃号，军阀专政，此兴彼仆，祸乱频年，民气日见销沉，影响且及于报界，同业君子，勉为其难，先固基础，徐图扩充，並自政治而渐注意于工商，由国内而扩目光于世界，报界之情形又一变矣。统观我国新闻事业，自唐迄今千一百余年間，略可区为四期：嘉道以前为官报时期，甲午以前为西人办报时期，光复以前为华报开创时期，民国以后为华报勃兴时期。而前三时期中，报纸作用徒事披露新闻，自入民国而后始有宣传民意之可言云。

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^① 戈公振

—— 一九二七年

(一)

自报纸历史上言之，《邸报》之产生。为政治上之一种需要，汉唐当藩镇制度盛行时，其驻在京师之属官，皆有《邸报》之发行。其纪载甚简单，无非帝皇诏令，诸臣奏议，与官吏升降而已；清初改称《京报》，其性质与前代无异。狭义言之，《邸报》与《京报》不过辑录成文，无评论，无访稿，似不足称为报纸，然当时消息，公开传布，惟此类物则谓其已具报纸之雏形，亦固无可非议也。《邸报》与《京报》之发行，初为朝廷默许之一种事业，有手写者，有木刻者，有木板印刷者。清末下诏，预备立宪，方正式发行《政治官报》，为朝廷宣布法令之机关。而当时各省所发行之南北洋官报等，且于谕折外有评论，有新闻，俨然与官报相颉颃。官吏有知宣传之利者，或自出资创办报纸，或收卖报纸以为一己之喉舌，此为半官报之滥觞。迨民报论调，多数转而鼓吹革命，清廷曾于内地厉行封禁，有代以官报之意，惜裨政百出，与人民希望相左，辛亥之局既成，非空言所能挽也。

蒐集社会发生之事件，以一定时期印行者，自西历一六一五年起，创于德国之政府报（Frank-furter Journal），而踵行于欧美各国。后二百年基督教新教教士东来，师其成法，于一八一五年发行华文月刊，刊名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》者，是为我国有正式报纸之始。发端于南洋群岛；流行于通商口岸，如澳门、广州、香港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、天津与汉口等处。同时又发行西文报纸，调查中国风土

人情，为其国人来华之向导。总之，其目的不外传教与通商二者，以厉行殖民政政策而已。西报之论调，有时似若为我国借箸而筹，实则大半便利私图，为外交上之一种策略。今且利用军阀之争，以鼓吹遏止革新运动，传播国际间之恶空气为事，肆无忌惮。此诚我国仅有之怪现象也。

其美在华之官吏教士，于光绪十三年，设广学会于上海，以资助中国革新相林榜。其最初之手段，在翻译新书，发行杂志，我国人颇受其影响，中日一战之后，学会纷起，而强学会为尤著，其所发行之中外新闻与强学报，主张君宪，实开华人论政之端。戊戌政变后，有志之士，既绝望于朝廷，乃举其积虑，诉之民众。有以介绍学艺为已任者，有以改良政治为目标者，于是一般对于报纸，不仅单纯的商情观点，而渐有活泼的政治与艺术思想。未几革命之说起于香港，蔓延于上海，沸腾于东京之留学界，而种族学说，尤单刀直入，举世风靡。虽清廷屡兴文字之狱，而前仆后继，不底于戢不止。国人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，当以此为极度矣。

共和告成以后，革命之目标失，报纸之论调，或主急进或主缓进，然其望治也尚同。迨经洪宪复辟之祸，受年年军人利诱威力之蹂躏，其论调愈，道德堕落。北京为政治中心，因利津贴而办报者有之，因谋差缺而为记者者有之，怪状尤百出，于是杀记者封报馆之案，亦屡见不鲜。自好者流，翻然觉悟，改向本身努力，以求经济之独立，然商业色彩太浓，渐失指道舆论之精神，是其病也。不过自全体言之，欧战以后，报界思想之进步，不可不谓一线曙光，如对内则有所谓废督裁兵之主张，对外则有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论调，苟循斯途以进行，则去中华民族自决之期不远矣。

(二)

自报纸内容上言之，同光间之报纸，因受八股盛行之影响，仅视社论为列文，经甲午、庚子诸变后，康梁辈之新民自强诸说出，始为社会所重视。革命派之报纸，则以社论为主要材料，执笔者亦一时知名之士，惟其有明确之主张，与牺牲之精神，故辛亥革命乃易于成功耳。当光绪末宣布预备立宪时，各报均延学律之士主笔政，《时报》创刊后，曾于社论外别立时评一栏，分版论断，扼其机枢，与今之模棱两可，不着边际者截然不同，故能风靡一时。民国初元，报纸之论调，虽以事杂言庞为病，然朝气甚盛，上足以监督政府，下足以指导人民。乃洪宪以后，钳口结舌，相率标榜，不谈时政，惟以迎合社会心理为事，其故或以营业为宗旨，不欲开罪于人，或有党派与金钱之关系，不敢自作主张，于是人民无所适从，军阀政客无所顾忌，造成今日之时局，报纸不能不分负其责也。

以新闻言，嘉道间杂志以教务为主要材料，商务次之，如教士之来去，船只之进出等是。咸同间日报踵起，以《京报》为主要材料，彙门钞次之，各公署牌示又次之，余为琐闻，然亦以官事为多。严格论之，直翻版之官报耳。光绪初，港沪西报渐多，移译较便，同时两地报纸互相转录，材料乃虞缺乏，然关系政治问题者仍不敢登载，故《聊斋》式之社会消息，乃占重要位置。甲午以后，维新运动发生，政治新闻始见进步，各国之新事新物，亦能尽量介绍。自戊戌政变以迄辛亥革命，则篇幅几为政治新闻所独占。外交问题，虽注意而不过瞭解，欧战以后，经过巴黎、华盛顿诸会议，始稍明瞭世界大势，而时见有统系之记载。年来因教育实业之发展，社会新闻已大改观，如教育商务之各有专栏是，然因军事扰攘，仍不免偏重于政治方面也。

以文艺言，初均以诗文戏评为补白之唯一材料，上焉者为斗方名士，自矜风雅之场；下焉者则以提倡嫖赌为事，腐气满纸，不堪入目。庚子以后，此栏始稍稍改观，时有关系政治之作。民国以后，虽篇幅大拓，而迄未脱旧日窠臼。欧战以后，世界思潮一变，《时报》别创《教育周刊》以灌输新潮，《晨报》、《国民公报》等踵起，于文艺上遂发生一大革命；不过重理论而轻事实，杂志之色彩太浓，未为一般读者所欢迎。近《申报》增设之《艺术界》，以介绍音乐、绘画与新书为事，新闻为主，议论为辅，渐有改良社会之倾向焉。

以广告言，其形初均若今日之分类栏，其性质亦完全属于商务者。甲午以后，始有学校广告，书报广告亦渐多。《申报》初创时，取价：西人广告较华人广告为贵，但以华人殊无登广告之习惯，不久取消，西人广告因是充满于各报。关于医药化粧品之类占地又特大，华人尤而效之，于是不道德不信实之广告日多。近年以外交关系，拒登英日广告，英日广告之数量，在外人广告中为最多，各报收入大受影响。然因报纸日见流行，渐得社会之信仰，华人广告已渐增多，凡有公告性质者，几无不以报纸为媒介。不过报纸之营业色彩亦渐重，至将广告登于新闻之中，颇碍读者视线，有时且为广告而滥登不道德不信实之新闻与评语，此则亟宜矫正者也。

(三)

自报纸外观上言之，最初报纸之形式，无论每日出版或两日以上，几一致为书本式，即以大张发行者，亦分页可以裁订。至光绪末叶，日报尚多如此，盖当时报纸之内容，新闻少而文艺多，直与书籍无异，故报纸常再版出售，而不闻有明日黄花之讥。至《时报》始废弃书本

形式，而形式上发生一大变迁。民国成立以后，报纸渐多，形式已归一律。其内容亦新闻日增而文艺日减，舍杂志外，遂不复为保存之便利计矣。

日报创自西人。故形式初亦与西报无异，分每页为四五直栏，其排列由上而下。至《申报》始废直栏，其排列由右而左。至《中外日报》始分横栏，至《时报》始分一纸为四大页，即今日通行之形式也。当《时报》初创时，其形式颇为社会所反封，以为面积太大，不便阅览，亦可见习惯之足以囿人也。

日报之编制，其初首为论说，亦有无论说者，次为新闻，其题目均为四字成语，逐日更换用之，末为诗文，均杂登一处。至《中外日报》，始分论说、电报、国内外本埠新闻及文艺诸栏，各报仿而行之，编制始见改良；然同一新闻常分载于前后数栏。又如上各报，年来电报字数激增，但亦以地方为纲，均不免缺乏统一之感。三年前《时报》始于电报试加题目，直率战事起，又将电报与新闻合登，以事实为纲，不为栏所限制，当时报界有非笑之者，今亦渐成各报之通式矣。

以印刷言，虽属机械作用，然报纸之进步，亦可于其中见之。嘉道间报纸多木版印刷，咸同间始多铅印，但印机甚陋，每小时只印一二百小纸。光宣间石印机与铅印机输入日多，报纸每日可出数千大张，然所用犹普通之印书机也。近来报纸销数大增，为缩短时间计，乃不得不用印报轮转机，每小时可印四大张者万份；同时为美术上之配置，且有用套色印报轮转机者。今因时局倏扰，各报常于最后数分钟内竞争消息之先后，则机械方面之改良，尚方兴而未艾也。

发行亦有可言者，嘉道间报纸多系送阅，咸同间报纸多系挨户乞阅，光宣间报纸始渐流行，然犹茶余酒后之消遣品也。共和国成以来，

报贩渐成专业，派报所林立，近则上海各马路之烟纸店，均有报纸出售，于是报纸有渐与日用品同其需要之趋势矣。

(四)

自报纸统计上言之，我国报纸之发展，其信而有征者，据《时事新报》记载，由嘉庆廿年至丰十一年之四十六年中，计有报纸八种，均教会发行，至光绪十二年增至七十八种。以地域言之，计新加坡一带六种，香港六种，广州二种，台湾、厦门、汕头共五种，福州三种，宁波二种，上海三十二种，汉口五种，九江一种，北京一种。以时期言之，计月刊三十六种，周刊八种，日刊一种，余或隔一日二日不等；是二十四年中，较前加之九倍强。又据《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纪事录》载，民国十年全国共有报纸一千一百十四种，内日刊五百五十种，二日刊六种，三日刊九种，五日刊九种，周刊一百五十四种，旬刊四十六种，两周刊五种，半月刊四十五种，月刊三百〇三种，季刊四种，半年刊一种，年刊一种；是四十年中较前又加至十五倍弱。今据中外报章类集社所调查，最近二年中，华文报纸之每日发行者，共有六百二十八种。以地域言之，北京第一，计一百二十五种，汉口第二，计三十六种，广州第三，计二十九种，天津第四，计二十八种，济南第五，计二十五种，上海第六，计二十三种。又外国文报纸之每日发行者，计英文二十六种，日本文十六种，俄文六种，法文三种，朝鲜文一种。就日刊一种言之，三四年中又有若干进步，若合以华侨报纸、学校报纸、公私政治学术社会团体之报纸，及一切属于游艺性质之报纸，不论每日发行或二日以上，其数当在二千种左右。就本國

言之，誠不無多少樂觀，然日本人口僅七千六百萬，有報紙四千五百種，我國人口四萬三千六百萬，只有報紙二千種，不啻一與十三之比，況銷數又不遠甚，歐美更無論矣，故從我國地大物博人群種種方面言之，現有之報，不能謂供求相應也。

(五)

自報紙改進上言之，言論自由，為報界切膚之問題，此問題不解決，則報紙絕無發展之機會。慨自洪憲以還，軍人秉政，禍亂相尋，有若弈棋，報紙之言論與記載，苟守正而不阿，則甲將視為祖乙，乙又視為祖甲，封報館扣報紙檢閱函電，十餘年來，數見不鮮。然而返視報界，則渙散特甚，無一機關可代表一地方之報紙，遑論全國。甚有幸災樂禍，以他報之封閉或或拘留為快者，彼且不自尊，欲人尊之也得乎？夫《出版法》之廢止，要求亘十年之久。《出版法》廢止矣，而邵飄萍、林白水之流，可以身死頃刻，則更無法律可言，豈不足以促我報界之覺悟耶？然英国有以「紅旗」名報者，德国有以「炸彈」名報者，國會中有共產黨，而其政府不之禁也。總之在位者不論何人，絕不喜言論自由，其摧殘也亦易，惟在報界一致團結，以與之抗，而人民又當為報紙之後盾，隨時防止惡勢力之潛滋，不稍松懈。蓋思想不能發表，徒成空幻，思想者必甚感苦痛，而郁積既久，無所發泄，終必至于橫決，國家運命之榮枯系之，擁護言論自由，實亦國民之天職也。

報紙為公眾而刊行，一評論一記事，又無往而非關於公眾者，故為公眾而有所陳述，報紙實負有介紹之義務也。此種陳述，依其性質，可分為二：一為積極的希望公眾事業之進步者；一為消極的更正新

闻记载之谬误者。我国报纸之态度，普通对于前者似认为主笔之专责，对于后者则视为当事人之特权。其偶设有「自由投稿」栏者，亦名难副实，一则因报纸不肯尽量宣布，以开罪于人；一则因投稿者常取谩骂态度，有越范围。于是「议论公开」之说，在我国遂末由实现。其在欧美，无论何人，凡关于公众之问题，均可投函报纸，苟三次不予发表，得诉诸法律，不过报纸为节省地位，得酌量删削耳。吾意议论公开而后，公共之意思乃见，今我国报纸之所重视者，只一般所谓「名人」「要人」之文电，然大半皆私见而非公论，大半皆政治问题而非社会问题，深愿主笔政者，今后能移易其眼光，开豁其胸襟，予平民以发抒意见之机会，勿执己见，勿护过失，而第以寻求真理为归也。

报纸之元素，新闻而已。今报纸所载之新闻，大半得诸通讯社，而此种通讯社，并非为供给新闻而设，纯系一种宣传作用，于是人民不能于报纸上见得正确之事实，而对于国家或国际政策之思想，遂易误入歧途，而无由集中，此至可痛惜之事也。英国名记者北岩(Northcliffe)曩在申报馆演说，谓「世界幸福之所赖，莫如有全国独立之报馆。」我国报馆，苟不以依赖为可羞与至危，则当憬然觉悟，合全国各大报馆，组织蒐集新闻之机构，以正确之中国事实，传播全国与世界，此匪特有助于国家之统一，良好政府之建设，及他日少年中国愿望之实践，即各国亦可因此明瞭我国之现状，而消除其隔阂，其有益于世界之和平实远且大也。我国字数，据《中华新字典》所载，多至四万有余，常用者不过四千。民国七年，教育部曾颁布注音字母，民国十二年，中华教育改进社曾函请各报改用语体文，而各报徇于积习，且因时间与经济上之关系，迄未有所表示。夫报纸为普及教育之利器，乃世人所公认，我国教育之不普及，又无待讳言，吾意报纸当此过渡时期纪事之文，宜力求浅显，勿引古典，勿用冷僻之字，字数

如能仿照日本报纸办法，减少至二千八百枚则尤佳，必使具小学毕业以上程度者，即有读报之机会；至文艺作品，当然不必拘定如此，则于文化之传播上大有裨益也。

海通以后，报纸日有外事之记载，如 England 之为英国，Paris 之为巴黎，Christ 之为基督，Motor 之为马达，因习用已久，为读者所谄知，然偶遇稍冷僻之地名人名，或事物之名，则译文此报与彼报异，今日与昨日异，甚至同日之纪载，前后又异。间有贩自日本者，如俄国之劳农政府，其原名本含有多数党意义，非如今日之所谓「过激派」。日本因此种主义不利于彼，故称之为过激以骇人听闻，而吾国报纸沿用之，去真意殊远。故吾国报界，应联合学术团体，延逮于中西文字之士，根求西文之字源，不问其为何国文字，而以一译名为标准，使成中国化。音义並译者为上，译义者次之，译音又次之。在此种标准译名未订定之前，各报如遇非通行之译名，须附列原名，俾读者易于考查。此事虽小，而关于一国之文化实大，在外人文化侵略之际，更有纠正上述错误之必要也。

在最近数年中，报界有二种新事实，有不可不注意者，即记者与工人之渐知团结，是盖报纸既成为社会之必需品，同时报纸又趋于商业化，于是有此二种反动发生。如记者之所谓「星期停止工作」案，如工人之所谓「废除工头制」案，虽皆未见实行，然与报馆当局，若已立于相对之地位者。又如上海报贩所组织之捷音公所，广州报贩所组织之派报总工会，隐操推销报纸之权，因利益多寡之关系，常与报馆起齟齬。且年来工潮澎湃，报馆工人时被牵入漩涡，报纸停刊，数见不鲜。此虽为一般政治与社会问题，然既与报馆直接发生影响，应如何研究预为消弭之乎！

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，而舆论之所自出，则根据于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。报纸者，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。故记者之天职，与其为制造舆论，不如谓为代表舆论；更进一步言，与其令其起而言，不如令其坐而听。耳有所闻，手有所记，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，莫不活跃纸上，如留音机器然，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，而舆论乃有价值而非伪造。否则报纸自报纸，国民自国民，政治自政治，固毫无关系也。我国报界之知此义者盖寡，故报纸之进步甚缓，而最大原因，即为缺乏专门人才。盖昔之服务报界者，大半非科举化之人物，法政学生化之人物，抱「学以为仕」之传统心理，视报纸为过渡宝筏，彼心目中只知有政治，故不知社会之重要；只知有官，故不知国民之重要；因官僚幕下集中式的政治，故只知有中央而不知地方之重要；又因功利心热，投机心切，至甘心为政治机关为党派利用，则亦必至之结果也。夫报纸有公众之需要而刊行，则纪载当根据国民心理，而后发达可期。今不问中央新闻、地方新闻与本埠新闻，均不离乎政治，而所论及者又为政治中最卑鄙而无思想学术关系之一片段，其不受社会欢迎必矣。因是报纸之生活愈难，遂愈不得不卯翼军人政客之下，假而记者随意下笔，便谓为代表舆论，军人政客利用几家机关报，事先鼓吹，随意作为，便谓为实行民主政治，此真滑稽之尤。又何怪报业之黯淡无光，记者之生涯愈为寥落乎！往者已矣，来日方长，深愿吾同业知环境之不良，有彻底之觉悟，重视本业，勿务其他，迎合世界之新潮，发皇吾侪之美质，天职所在，其共勉之！

(六)

今日所待讨论之问题，吾姑举其大者著者如此。总之，我国之报

纸自明以前多系手写，只供少数藩阀缙绅之阅览，后虽改为手印，然为数甚少，极难普遍。光绪中因印刷术之进步，遇事镌版传布，由是军国之政，可家喻而户晓，不独富贵者能知之，即贫贱者亦能知之，由此一方面言，是日趋于平民化。往者社会之视报馆，盖卖朝报之流亚，服务其间者，文人之末路也。今报纸渐成社会之日用品，人民之耳目喉舌寄之，于是采访有学，编辑有法，学校列为专科，书肆印为专集，以讨论报纸之最高目的，期合乎人群之需要，由此一方面言，是日趋于艺术化。准斯二者以观既往测将来，则于报学思过半矣。

《五四》时期报刊工作的改革^① 李龙牧

「五四」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发生了质的变化的时期，新闻出版工作也有了重大的改进，这些改进是我国报刊工作的丰富的历史传统中的重要部分，认真地研究这些经验，仍然会对推动报刊工作的继续改进带来好处。

报刊的政论传统的恢复和发展

研究「五四」时期报刊工作的改革，我们首先发现的一个显著特点，就是进步的报刊恢复和发展了我国报刊的政论传统。

政论的传统是我国报刊的一个重要传统。但是辛亥革命后，在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之下，不附袁的报刊大批被封闭，这个优良的传统也几乎中断了。这种传统的真正恢复，在一定的意义上说，是从《新青

年》月刊开始的。《新青年》从一九一五年出版时起，一直强调思想斗争，却极少直接评论实际政治问题，甚至公开宣称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」，成为一项长期执行的编辑方针。不过，《新青年》所进行的思想斗争与当时的实际政治斗争有紧密的联系。在袁世凯进行帝制阴谋活动的时候，《新青年》就极力地宣传民主主义思想，主张建立「唯民主义」的国家。袁世凯可耻地死去之后，《新青年》对继起的帝制复辟的阴谋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抨击。这些就是这种联系的具体表现。而这种思想斗争本身，也就是从意识形态上对封建统治的攻击。《新青年》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论文，常在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政论，要把两者绝对地区分开来是没有意义的。

从一九一八年，由于十月革命的伟大影响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我国广泛传播，而这种传播又是与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的。因而常是以政论的形式而不是以思想介绍的形式出现的。《新青年》发表的李大钊同志最早的两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之一：「庶民的胜利」，原来是他在天安门前的群众政治集会上的讲演。也就在这时，反军阀的政治斗争逐渐高涨起来，到巴黎和会上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后，发展成为伟大的「五四」运动。在这个时期中，在新闻和出版工作中，便出现了以政论为中心，并直接服务于实际的政治斗争的报刊。李大钊同志和陈独秀主办的《每周评论》（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出版第一期），就是为了直接从事政治斗争而创办的。「五四」运动展开后，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般创办起来的报刊，多数都以重视政论、从事实际政治斗争为主要特征。在这些报刊中，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的《湘江评论》周报（一九一九年七月出版第一期），成了当时报刊评论的典范。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中，明确地指出了「五四」运动